



挖掘藏书故事 传承典籍文化

多种角度、不同形式让古籍走进百姓生活

□本报记者 刘晓立

中华典籍文献世代相传，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弘扬典籍文化，助力文化传承，近年来各界纷纷开发了多种有效形式，挖掘藏书故事，试图走进观众与读者生活，让古籍“鲜活”起来，在讲述古籍故事的同时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记录 纪录片让古籍深入人心

近两年，聚焦古籍的纪录片、综艺节目不断涌现，通过人物故事切入，借助“人”的要素让古籍“鲜活”起来。去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了《典籍里的中国》，其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的形式，网络视频播放量迅速破亿次，其中《尚书》一集的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就超7亿，成为现象级传播产品。今年2月份登陆B站的《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首集就聚焦古籍，特别是记录了目录版本学家沈燮元用七十载的光阴研究古籍版本和源流，98岁高龄的他仍旧每天坚持坐公交车到南京图书馆工作，圈粉的同时更是让观众十分感动。

近日，首部中华古籍活化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在西瓜视频上线，观众目睹学者和艺术家修复古籍、演绎古籍内容的同时，也感受到原本束之高阁的古书逐渐“鲜活起来”；而《中国影像方志》《古书复活记》等纪录片节目也让古籍逐渐深入人心。

讲述 音频播讲追溯藏书楼与藏书家故事

在天津，从明清设卫筑城到近代历史的风云际会，其私家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的基因始终徜徉在这座城市之中，丰富着这座城市的底蕴。周叔弼、严范孙、卢木斋、潘复、徐世昌、袁克文……他们的藏书楼和藏书故事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特色风景。

自3月28日起，天津生活广播“城市记忆故事”栏目陆续推出由文化学者、天津师范大学王振良教授播讲的系列专题《天津的藏书楼和藏书家》。王振良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曾在《今晚报》社工作过，他在天津历史文化辑佚研究上付出良多，不仅主编了天津大型历史文化丛书“问津文库”，而且积10年之力通过文献稽考和田野调查，出版《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一书，系统挖掘整理了天津近代藏书家和藏书楼。

《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一书共收录文章24篇，记述了约30位天津藏书家事迹，并对天津现存的21



处藏书楼进行了考察和认定。包括吴重熹与石莲庵、潘氏父子与华鉴阁、李善人家族与藏经阁、徐世昌与书髓楼、翁氏家族藏书在天津、渠氏家族藏书在天津、胡宗楸与梦选楼、陈一甫与居敬轩、蔡成勋与希郑轩、傅增湘与天津双鉴楼、金梁与瓜圃、张重威与默园、刘少山藏海源阁珍籍等，通过对这些藏书家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近代藏书史研究的空白。

“城市记忆故事”推出的系列专题《天津的藏书楼和藏书家》即以此书为基础进行讲述。

比赛 “藏书故事”赛让大学生亲近古籍

近日，复旦大学古籍保护学社举办的第二届“藏书故事”赛初赛圆满结束，八位同学在初赛中脱颖而出，顺利晋级复赛。

李香衣同学认为官家藏书是中国藏书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她在比赛中以宋代秘书省藏书为主题，向大家介绍其藏书借阅经验，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让大家对宋代秘书省的借阅管理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并对借书不还者的检举制度给予特别关注。马一白同学介绍李清照“归来堂”藏书，搭配唯美的背景音乐，向大家娓娓道来这位著名女词人的藏书故事，最后介绍其藏书毁于战火的悲剧时，引发了同学们对战时古籍文物保护措施思考。

吴予晨同学向大家介绍了其家乡福建藏书家陈第的戎马一生，这位文武兼备、“惟书是癖”、拥有万卷藏书——世善堂藏书楼的抗倭名将，是中国历史上武将藏书家的典范之一。王涵笑同学选择家乡镇江拥有瘞鹤铭残碑的焦山书藏，让大家了解到镇江除了南三阁之一的金山文宗阁以外，还有另一处拥有大量藏书的地方。



范侯杰同学介绍了四川同乡李调元。他从李调元对巴蜀文献进行的整理以及出版的蜀学巨著《函海》入手，以第一人称方式，对李调元“万卷楼”藏书情况及命运浮沉进行讲述，结构清晰，内容完整，好像是李调元真的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一样，令人难忘。汪敏同学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扬州文汇阁，顾长春同学在聆听演讲后表示，乾隆皇帝下特别谕旨，让文汇阁四库全书允许士人学子外借、传抄阁中书籍，这种开明的理念与自己所讲的金陵甘氏津逮楼的书籍管理利用理念相近，令人动容。

白逸凡和乔镛存两位同学都选择了别具一格的藏书故事和叙述角度，前者以钱谦益与柳如是爱情故事为主线，介绍绛云楼藏书的聚散；后者从金庸武侠小说入手，从文献载体和书籍保护角度向大家介绍人皮书写的《九阴真经》、藏入猿腹的《九阳真经》，以及倚天剑中的《武穆遗书》、圣火令上的“乾坤大挪移”等脍炙人口的武林秘籍。

初赛结束后，同学们回顾自己印象最深的藏书故事，交流心得体会。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肯定了大家选题的新颖性、讲述的故事性。后期复赛将在线上举行。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学社是以古籍保护为共同志趣，以古籍保护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共同话题，以交流、实践、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相关知识和技能为宗旨的学生社团。其举办的“藏书故事”比赛，让大学生对“藏书”“古籍”不再陌生，感受藏书家当时的环境和心境的同时，抵达历史深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技艺”被列为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报讯 近日，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技艺”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列为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技艺”成功申报入选第四批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之后，在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领导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积极参加非遗工作培训，按照非遗保护工作要求，完善修复技艺传承和培训宣传各项工作。

2019年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获批“古籍修复技艺”省级非遗专项经费支持40万元，主要用于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购置设施设备、举办省级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外出参观交流学习，并为8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点配置修复设备。非遗专项经费的合理利用，使全省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得到了加强，古籍修复技艺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今后，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将继续努力推动“古籍修复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迈上新台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作出新贡献。（王琨）



普查员手记

从2015年起，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以实现“十三五”期间基本完成全国古籍普查为目标，在全国组织开展了“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通过发动高校学生参加文化志愿服务，帮助有需求的单位开展古籍普查，有利促进了全国古籍普查任务如期基本完成。志愿者们也在志愿服务中亲近古籍，受到洗礼，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貌。

行走在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的路上

□魏琪曼 天水市图书馆



受疫情影响不能外出上班，待在家中随手翻阅日记本，之前两次古籍普查志愿者的经历随着日记中的只字片语又仿佛回到眼前。

2020年8月初，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致电天水市图书馆，希望我馆能派人参加由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策划的“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甘肃行”甘谷站的古籍普查工作。十年前我馆做过古籍普查工作，相关同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虽说经验不够丰富，但至少可以让县馆古籍普查工作少走弯路。馆里研究后，派我和其他两位同事一同前往甘谷县图书馆，帮助该县图书馆整理古籍、完成普查任务。

令人刮目相看的县域古籍藏量

甘谷县历史上也曾称冀县，是陇右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宋有“茶马大市”之称，明有“商旅之家”之誉。甘谷县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古往今来人才辈出。甘谷县图书馆就坐落在甘谷县冀城广场的南面，不大的五层楼上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多家单位。古籍存放在一间不足60平方米的房间内，密密麻麻地排放在木制的旧书架上。这里的古籍大部分没有函套，书籍上面也落满了灰尘；角落的纸箱里也塞满了古籍，保存得比较完整，依旧是最初的状态，古籍藏量比我想象中要多。由于他们工作人员少，古籍没有专门的人员保管，所以也没有整理。

我们和甘肃省图书馆的老师共十一人，在宋琰老师的带领下按分配好的任务有条理地开展：天水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负责登录本，按顺序

从架上取书分配给我们；我们则每人守着一台电脑，将分配到的古籍从除尘处理到清点著录，依全国古籍著录平台的要求详细地进行登记，登记项目包括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年代、版式尺寸、装帧册数、批校题跋、钤印、丛书子目、上传书影等，全部完成后再由天水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架整理。在登记著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古籍善本，如明万历年间的《晋书纂》，还有善本《阳明先生文集》《道山先生诗集》《困学纪闻》《吾学编》《诗人玉屑》等，其中有一部古籍还得到过修复，修复平整，却不失历史沧桑感，让人不禁感叹在过去的某个年代，古籍修复师用原始的修复工具，竟修出了如此完美的古籍，使得古书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令人可叹可敬！

平台著录遇到断代不清时，我也向同行的老师学习请教，特别是书中的红色钤印，

或在正文，或在序前，蕴含深广、形式多样、各具奇妙。古籍因有了这一枚枚红色印记而增韵添彩，我也越发喜欢这些藏书印，遇到不认识字的时候，总想探个究竟，好在我们有个强大的后援——甘肃省图书馆的绍正春老师：只要通过手机将印文发送过去，绍老师很快就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字。请高人指点，解惑后甚是欢喜，仿佛又攻下一大难题。但再深入一点，比方说这印章是何人所有，这些钤有藏书印的书又经何人之手流转至此，如何到此并保存下来？我是没有机会去深究，留下些许遗憾，若后来有人能将某部古籍某些藏书印添加深入研究，一定也很有意思的事情。

老师们工作起来都非常忘我，一干就是一整天，来得早走得晚毫不懈怠，经过八天的连续工作，共完成了513部（4729册）古籍的普查登记任务，也摸清了甘谷县图书馆

馆藏古籍数量，民国之前登记在册的古籍1052部（18103册），其中善本111部（1917册）。就在我们结束甘谷县图书馆的普查工作准备离开时，又听说甘谷一中“子材图书馆”还珍藏有一批古籍，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一个县级地方古籍藏量刮目相看，只好留待下次普查了。



为了共同的目标

连续两年两次的志愿者活动，给我的感受却不一样，第一次志愿者中都是我们图书馆的专业工作人员，而第二次普查工作志愿者中加入了新生力量——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招募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志愿者，他们全部是高校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他们有的学古籍修复，有的学历史，有的学古典文献，专业不一，但是都与古籍紧密相关，所以很容易上手。经过专业老师的培训，大家边干边学，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喜爱传统文化、喜欢古籍，为了共同的目标，才不远千里来到甘肃加入古籍普查文化志愿者队伍，克服南北生活习惯差异，克服疫情影响带来的种种不便，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完成了普查任务。通过这次活动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当代大学生们对中华古籍及传统文化的热爱，年轻人已经有了古籍保护的意识，并且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传承和保护古籍的种子已经播撒在同学们的心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年轻人中一定会有人再次加入到中华古籍保护利用的大队伍中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贡献属于他们的力量。

我们都只是众多古籍普查者中的平凡一员，正是有了大家克服困难积极配合的决心，齐心协力完成古籍普查的信心，才保证了甘肃省乃至全国的古籍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摸清古籍家底查清古籍数量，将古籍数据搬上数字化平台，让古籍真正“活”起来，让古籍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烂光彩，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这是我们每一个古籍普查者的心愿。

志愿者们传递的爱心

我第二次参加“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甘肃行”是2021年7月21日—8月15日，这次主要是针对市县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的古籍进行普查登记，有招募来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及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大家分别对兰州市图书馆、陇东学院图书馆、礼县博物馆、西和县博物馆、崇信县博物馆、张家川自治县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和平凉市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开展古籍普查。我参与了天水市博物馆、张家川博物馆、西和县博物馆的古籍普查，基层博物馆的古籍虽然数量不多，但古籍保存硬件设施都很好，有的馆古籍多则上千册，少则二三百册，其中不乏善本精品。每发现一部珍贵古籍我们都欣喜不已，相互传阅学习；每看到一部破损残缺古籍，我们又会心痛不已，深感作为古籍守护人的责任重大。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保护古籍摸清家底，将这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献长久地保存下来，为将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古籍，整理古籍打下

基础，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古籍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这次普查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近一个月的时间，甘肃省图书馆副馆长李芬林亲自驾队，一面协调开展古籍普查志愿行动的博物馆、图书馆接待，以及人员的统筹，一面安排大家出行、住宿、饮食，随时掌握古籍平台数据的进展，为我们提供坚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在我们做古籍普查的时候，各地疫情又有所反弹，在疫情管控严格的情况下，走到哪里都需要查验健康码、行程码，还需要经常做核酸检测，不仅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也加重了大家的担忧，甚至有些大学生志愿者担心回不了家。因为这次志愿者中有来自南京的同学，李馆长为同学们的安全出行，安排预订车票、核酸检测，多次往返于各个图书馆、博物馆、医院、高铁站之间，直至结束每位学员报上一路平安，顺利抵达，她才放心，让我看到了省馆领导的责任和担当。

我的同事马亚萍每次到中午干完活我们去吃饭时，她多

数情况是不去的，说中午有时间多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下午继续干活，晚上再吃。我们开玩笑说以后干活就要找马老师这样的人啊，干工作认真，光干活不吃饭。我的另一位同事李东晖不光要做平台数据，还要兼做我们的出行司机，每走一地都不辞辛苦负责接送我们，如果没有这么现成的司机和车，大家出门还真不方便。还有甘肃省图书馆的曹有林老师，做完崇信县博物馆的古籍就赶往礼县博物馆；李辉老师做完陇东学院图书馆的古籍，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地赶往西和县博物馆继续投入工作；绍正春老师腰不好，绑着腰带还坚持工作，走到哪里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每次我们遇到古籍中难辨的藏书印时就求助绍老师，从中学了不少印章知识。我那次出门时不巧左手食指受了点伤，一直戴着手套，但不影响工作，只是每次干完活记得用碘伏消毒，整个普查活动结束时我的手伤也愈合了。我们中间还有朝气蓬勃喜欢锻炼的何盼盼



和暖男蔡朝阳，他们一个是西南大学在读研究生，一个是大学本科刚毕业，他们做完兰州市图书馆古籍数据后，直接赶到张家川博物馆和西和县博物馆，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时，蔡朝阳接到了人社局电话，他参加的公务员招考正式录取了，这真是令大家高兴的消息。

清末同文书局古籍影印小记

□北京 徐蜀

前文(《清末古籍影印小记》,见4月7日《藏书报》)谈到清末影印古籍历史及特点,也提到当时影印古籍衰败的原因,其实当年石印业一落千丈的原因,固然同废科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印刷业主导下的古籍影印,主持者目光短浅且唯利是图,又缺乏古书版本、出版专业方面的知识,注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命运。下面谨以同文书局为例,略加说明。为什么以同文书局为例?因同文书局在清末的古籍影印活动中,成绩和影响最大,而且是国人开办的首家石印书局,其停业的时间又在废除科举的八年之前,更具代表性。

光绪七年(1881),粤商徐鸿复、徐润开设了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事翻印古籍善本。《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八年附记,对同文书局的始末作了一个简要概括:“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数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开办,甲午年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兴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停办。”

堪称“石印之冠”

说同文书局影印之书“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绝非妄言,就以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部书《康熙字典》《二十四史》为例,便可证明。先说《康熙字典》。

同文书局从清光绪癸未(1883)开始影印《康熙字典》,当年出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在天头排列了篆字。原版《康熙字典》是没有篆字的,这一版大概是《康熙字典》影印本中首次增加了篆字。此后增篆《康熙字典》便成为主流产品,广受欢迎。光绪庚寅季春(1890),同文书局

推出了半叶十八行,行二十四字本《康熙字典》,在字体缩小不明显的情况下,比殿版十六行本节省近十分之一的篇幅,又增加了篆字,且编校精当,字迹清晰,很快受到追捧。至迟在民国十四年(1925),中华书局便开始影印同文书局十八行本《康熙字典》,强强结合,由此开启了同文书局本《康熙字典》畅行百年的辉煌史。1949年之前,中华书局本《康熙字典》,封面书签均标有“同文书局原版”字样,书前牌记为“同文书局原版中华书局精印”。195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精装本《康熙字典》,并在每页下方标注“同文书局原版”字样,至今重印了上百万册。

再说《二十四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是中国早期石印业者最为看重的“热门”,捷足先登的是同文书局。同文书局《股印二十四史启》云:“欲窥全史者,非殿版不可,而殿版又非乾隆初印不可。盖重修晚出之本,往往渐失其真,不足贵也。道光以前,累世承平,人文蔚起,通都大邑,必有度藏全史,以备大雅观摩;兵燹之后,斯文浩劫,志学之士欲求全史而读之,盖有登天之难焉。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光绪十年(1884),同文书局本《二十四史》陆续面世。该书高20厘米,宽12.6厘米,属于32开本尺寸;半叶版框高15厘米,宽10厘米;十行,行二十一字。开本不大字却不小,既便于皮藏,又省料利于降低书价。

众说“同文本”

民国学者钱基博,对同文本《二十四史》颇有微词,他说:“光绪间,泰西石印法初传至中国时,粤之徐氏创同文书局,印精本书籍,最著名者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张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尤可笑者,自言所据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无《旧五代史》,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板心亦题乾隆四年,书估无识,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字迹清朗,称为佳本。竹筒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书局本,故错字一仍其旧。”

钱基博所云多不属实。首先,谓“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

明显,便于付印;又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似证据不足。殿本《二十四史》面世,至光绪十年同文书局影印之时,不过百年,《旧五代史》则又晚四十年,“字迹漫漶”应属个例;“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系当时石印业普遍之流程,即后来商务印书馆亦无例外;至于“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不但钱氏未能举证,后来也无人指出。其次,“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此说绝非事实。徐润为清末著名实业家,“四大买办”之一,兼任招商局会办(其个人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与李鸿章、张荫桓等朝廷权贵关系密切,搞到一部初印殿本《二十四史》应该不难。前引《徐愚斋自叙年谱》即明言“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同文书局《股印二十四史启》又谓“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旧五代史》自当在其中。并且,《旧五代史》皇皇一百五十卷二十四册,“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写后尚需雕版,谈何容易!从时间上看,《旧五代史》与《史记》等均系“光绪十年甲申仲春”首版之书,根本没有“别写一通”的可能。实际情况是,同文书局编印者误以为所购之《旧五代史》(乾隆四十九年校刊本)非初印,特将中缝“乾隆四十九年”改为“乾隆四年”,冒充“初印”。此举虽属无知妄为,与“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性质不同,同文书局《旧五代史》系乾隆四十九年殿本是没有问题的。同文本《二十四史》因印制精良,后为竹筒斋、中华书局多次翻印,销量多达上千部。

先行者的贡献

总体上看,同文书局影印本的质量在当时堪称一流,因而《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成为同行翻印的底本,并标注“同文原版”以提高身价。另外,同文书局影印书品种繁多,凡当年热门之书应有尽有,除前文徐润自述之书外,能见到者尚有《三礼图》《经学辑要》《四书经史摘证》《宋本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尔雅音图》《切韵指掌图》《韵史》《纪元编》《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上百种,皆纸张白净,字迹清晰,质量上乘。

然而,细查之下可以发现,同文书局所印之书,与其他大小书庄之书并无本质



区别,多为重复出版,版本也是常见的清代通行本,所谓《宋本说文解字》《宋本切韵指掌图》,实为清代翻刻本。在此情况下,同文书局精心校阅、印制及优质的纸张材料,反而增加了成本,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大环境下,“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直至关张停业,就不足为怪了。无独有偶,情况与同文书局相似的点石斋石印书局,也于宣统元年(1909)停业,并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

发人深省的是,历经清末三十余年,数十家书局书庄翻印古籍的热潮后,张元济先生在1920年写就的《四部丛刊启》中,感叹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这段话,几乎全盘否定了此前的古籍影印成果,虽略显武断,却也八九不离十。

清末古籍影印最大的成绩:在照相石印技术及古籍版式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为民国时期古籍影印的大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同文书局殿本《二十四史》、十八行本《康熙字典》等书的开本,堪称“黄金”尺寸,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与此相仿,大概受到启发。张元济先生对此开本的评价甚高,曰:“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度藏,字大则能悦目。(《四部丛刊启》)再有,“四拼页”“九拼页”等割裱缩印方式,也为后人大量采用,如中华书局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都是九拼页,将鸿篇巨制的古代名著大幅缩小,为大部头古籍图书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篆刻集览》稿本

□河北 晓曦

《篆刻集览》写本一册,大开本,明代墨绿色花草纹织锦书衣,白棉纸内页,无板框,无界栏,无鱼尾。半页8行,行20字。全书辑录历代篆刻相关知识,细研究,内容又可分为两大部分。前13个筒子页,为明朝佚名氏(约为隆庆年间人士)以隶书笔法写就的小楷,字字清雅,笔墨一丝不苟。天头有墨笔批注,行间有朱笔校改,不避清讳,称明朝为“国朝”,其中有“国朝文太史”“国朝隆庆年间”内容。后37个筒子页,书写有小楷意又笔墨流畅,提按分明,古意盎然。避清讳“玄”“邱”,不避“宁”字,后有乾隆年间署名、落款。全书内容丰富而系统,既有篆刻的理论总结,也有实践经验、心得体会,是一册实用性很强的篆刻文献资料。查各书目,未见著录。

阅读此书内文,明人书写部分可分六个单元。开篇是“篆原”,论述篆书起源及发展演变历程;二是简述古代玺、印、章的区别与各朝代特征,包括玺、印、章、符印、三代印、秦印、汉印、晋魏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国朝印等内容;第三单元则是分别介绍不同材质印的特



点,包括玉、金、银、铜、宝石、玛瑙、磁、水晶、石、象牙、犀角、摹印、铸印、刻印、凿印、刻玉印、碾印等内容;第四单元叙述印文、篆法,包括白文、朱文、篆法、章法、笔法、那移法、增减法、辨阴阳文、印体等内容;第五单元分述不同用途的印,包括回文印、名印、表字印、臣印、号印、书柬印、收藏印、斋堂馆阁印等内容;最后一个单元介绍制、鉴印的方法,包括印钮、印制、成文、重字法、破碎、朱白、玉筋、深细、印品等内容。

清人书写部分大体可分为四个单元。一是辑录名人论述,包括杨用修曰、吾邱子曰、蔡琰曰、王弼曰、王右军笔阵图云、黄山谷云、吾邱子行衍曰、周公谨曰、杨长倩曰、李阳冰云、张怀瓘云、古书法云、郑子经曰、黄贞父序余印式云、吾所谓章法者、岳珂跋米元章、临智永千文云等内容,

在“王弼曰”论八分书法后,书写者以“按”语形式,对秦隶八分书之兴、废及今人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了论述,约有160余字。在“周公谨曰”名下,书写者以“余亦曰”为题,加了近百字的论述。在“黄贞父序余印式文”之后,书写者更是以“吾所谓章法者”开篇,写有600余字的论述。可见,书写者不仅辑录了他人论述,而且书写了许多个人的认识和体会,也说明,书写者曾编著过《印式》书籍。第二单元为历代对书体的分述,包括吾邱衍字源七辨、六书、秦书八体、甄丰六书、唐玄度十体书、梦英十八体书、韦绩纂五十六种书等内容;第三单元为辑录名家印谱、印人序跋,包括胡曰从印存序略、陈丹衷序略、周亮工序略、吴奇序略、周栋园印人传姓氏、杂记、印人传(节录)、四明沈明臣氏印数序、京口俞希鲁印数序、数序(节

录)、画史(节录)、妮古录、听雨纪谈、焦氏笔乘、名蹟录、嫩真子等内容;第四单元则是讲述印色制、用、贮、鉴定之法,包括印色法秘本、染沙法、红绒法、晒油法、合印色法、用贮法、携游、辟谬等内容。

在全书最后一页,有一跋,或可说明此书渊源,现抄录如下:“忆予从事于石楮铁笔之间,历有年所。虽于昔人之奥妙未得万一,然雅俗之间,颇有微会。偶得篆刻抄本半帙,不识作者姓氏,其于作印之原流、制印之工巧似得其概。因徐空,副检诸书之有与印章相发明者,录之以成全帙,总名《篆刻辑览》云。乾隆己卯季夏伏日,灌古居士跋。”并钤有“刘绳祁符”“书樵”“竹所”三方印章。而在书正文第一页则钤有“灌古居士藏书记”印章。

由此,似可断定,这是一册篆刻文献方面的未刊明、清稿本,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价值。明代稿、抄本极罕见,此书值得收藏、研究。

该书多年前以极廉价格得于旧书摊,想来也是一件乐事。只是“灌古居士”生平及书中一些内容仍需进一步考证,任务还不少。

明代魏校的《庄渠先生遗书》

□范月珍 山西省图书馆

魏校，字子才，号庄渠。苏州昆山人，明成化十九年（1483）生，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南京刑部郎中、广东提学副使、江西兵备副使官，累迁国子祭酒，太常卿，谥恭简。魏校曾居苏州葑门之庄渠，故自号庄渠。魏校著述主要有《六书精蕴》和《庄渠先生遗书》两种，《六书精蕴》是其侄魏希明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所刻，《庄渠先生遗书》则是魏校身后所刻，也是魏校著述的合集。

《庄渠先生遗书》有十二卷、十六卷和二十六卷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内容有增补，但是行款、字体和版框一以贯之。二十六卷本刻成之后，魏校著述未再刊出，也没有翻刻和补板，但是，《庄渠先生遗书》在流传过程中，仍然有一些疑惑与分歧，值得我们关注。

壹

体例上的延续和变更

明嘉靖四十年（1561）夏，苏州知府、太原人王道行为“表彰先贤文集，以崇正学事”，征得魏校门人、军事学家郑若曾家藏的魏校遗书若干卷，予以刊行，校刊事宜由王道行主持，归有光校对。遗书按文类分为十卷，分别是：卷一“奏疏、经筵、讲章”，卷二“讲义”，卷三、卷四“书”，卷五“说”，卷六“序”，卷七、卷八“谱牒”，卷九、卷十“公移”。在刊刻这些遗书的同时，又搜集到一些文稿，这些文稿全部是“书”类，虽然前面文稿中包括了卷三和卷四两卷“书”类，但前文已经刊就，新搜集的“书”不便与其合并，为避免目录和内容有两部分“书”类，在体例上引起混乱，编者便将后来搜集整理出的“书”命名“拾遗”，在“拾遗”之下再按文类标注“书”。后整理的“拾遗”分为两卷，续于十卷之后，成十二卷本。

十六卷本是在十二卷基础上增刻的，增刻了“书”“说”“序”和“志铭”四个文类，分四卷，其中，前三卷是“书”，最后一卷是“说”“序”和“志铭”合卷。新增的四卷目录和内容延续了之前十卷补二卷的做法，续于十二卷之后，继续称“拾遗”，形成十六卷本。

十二卷本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夏，十六卷本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从序文和牌记看，两个版本几乎同时刻成，由于十六卷本内容更丰富，很快便替代了十二卷本，所以，目前十二卷本并不多见，只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四家机构有收藏。

嘉靖四十二年（1563）仲春，在十六卷本的基础上，《庄渠先生遗书》再增补了六种十卷经史文稿，分别是《大学古文》一卷、《大学指归》一卷、《周礼沿革传》四卷、《春秋经世》一卷、《经世策》一卷、《官职会通》两卷，与之前的十六卷合成二十六卷本。

所不同的是，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所收录的都是魏校的文集，后增补的十卷则是他的理学著作，目录和内容都无法与前十六卷合为一体。所以，续入的十卷经史文稿自成体系，有单独的目录和内容，但题名还是《庄渠先生遗书》。

贰

从苏州府官刻到魏校家人自刻

从十二卷本到二十六卷本，校刊者是有变化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由苏州府组织刊刻，二十六卷本续刻部分则由魏校之子所为。

十二卷本由苏州知府王道行主持刊刻，各卷卷端刻有“门婿归有光编次”大字一行。装帧成八册，每册的尾页刻有“苏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两行字，凡两卷合为一册者，只有后一卷的卷末有校刻题记，其他卷则没有。归有光与捐出魏校稿本的郑若曾同是魏校的门生，也同是魏校弟弟魏庠的女婿，所以，十二卷本归有光姓名前刻有“门婿”二字。

十六卷本较十二卷本，在卷前增加了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苏州府知府的牌记，府牌要求昆山知县亲自校正《遗书》，并批示刻书经费从苏州府和昆山县的“无碍脏赋银两”支出。在增刻十六卷时，前十二卷正文内容未增减，但是将“门婿归有光编次”和“苏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的板刻文字铲掉，卷端另刻“苏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昆山县知县清河张焯同梓、门人归有光编次”小字一行，增加了昆山县知县张焯的名字。所以，十六卷本的校刊是苏州府和昆山县共同主持的。

二十六卷本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此前一年，王道行已卸任苏州知府，另任苏松兵备副使。离开苏州，就不便要求苏州府和昆山县出资刊刻续集，所以后续刊刻的十卷由魏校之子魏中甫所筹划，门生俞国振与安希尧协力赞助而成。这一情况，在二十六卷本新增的俞国振序文和刊刻题记都有体现。增刻二十六卷时，并未补前十六卷的校刊题记，只是在新增的后十卷卷端，

刻了“兵备副使太原王道行梓、门人归有光校”一行或两行，此处，王道行被称为兵备副使，校刊人也不见昆山知县张焯。另外，俞国振在叙文中也提到：“我师《遗书》，大宪副龙池王公已梓行，其《周礼沿革传》《春秋经世》《经世策》《朱子遗书》俱未及梓。……我师嗣子中甫谋并梓行，国振敬与门下士安希尧协力赞助，共求胜事”。说明后续十卷集刊一事，是由魏校之子魏中甫所筹划，门生俞国振与安希尧协力赞助而成的。安希尧是擅长铜活字印刷术的无锡人安国之曾孙，家族世代刊刻图书，他本人也刻过《吴皋先生续集》四卷，请他协办，必然与其丰富的校刊书籍经验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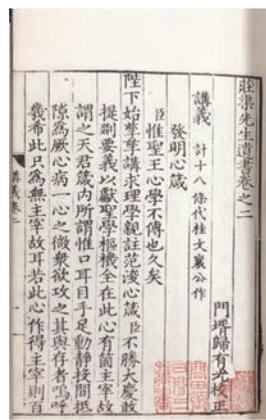
叁

近代以来提要 and 著录中的几个问题

魏校著述，旧文献多有收录。《明史》“艺文志”有两处记载：子部儒家类收“《庄渠全书》十卷”，集部别集类收“《庄渠文集》十六卷《诗》四卷”；《千顷堂书目》也有两处记载：集部别集类收“《庄渠文集》十六卷又《遗书》十卷又《诗稿全篇》四卷”，子部儒家类收“《体仁说》一卷又《庄渠全书》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皆收“《庄渠遗书》十二卷”；《嘉业堂藏书记》收“《庄渠魏先生遗书》十六卷”，皆与现存版本无异。不过，自清末以来的提要 and 著录中，仍然存在一些分歧。

一是体例。清人董康在《嘉业堂藏书记》提出：“卷十一至卷十六，‘拾遗’。内，‘书’居十之九，当时编次，不附丽三、四两卷之后，不详”。他提出的问题是：卷十一至卷十六是“拾遗”，共有六卷，其中五卷都是“书”，占“拾遗”比例有十之八、九，这么多的“书”，却没有与卷三、卷四的“书”合刻在一起，而是在“拾遗”之下分出一个“书”类。究其原因，有可能为十二卷本流传不广，他并没有看到十二卷本，因此无法将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结合起来看，也不了解该书有十卷续十二卷、十二卷续十六卷两个编校阶段，“拾遗”是在前卷已经刻成，后卷相同文类无法并人的情况下所为。

二是底本。清乾隆年间，《庄渠魏先生遗书》被收入了《四库全书》，所入内容是十六卷本。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却称此书为十二卷。关于卷次相悖问题，王重民先生认为《总目》和《简目》作十二卷是“六”和“二”的文字之误，他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中提到：“按卷十一至十六题为‘拾遗’，《总目》《简目》作十二卷者，字之误也，《库》书实亦十六卷。卷内有：‘皇十一子印章’‘治斋斋印’‘张在辛印’‘卯君’等印记”。有“皇十一子印章”等印者是清代成亲王永惺的藏书，这部书现存国家图书馆，未作四库底本，而国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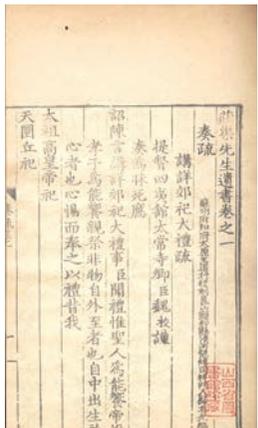
十二卷本卷端



二十六卷本经史文稿卷端



十二卷本校刊题记



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卷端



十六卷本、二十六卷本苏州府牌

书馆同时有十二卷本一部，内有翰林院印及四库馆臣校改字样，却是四库底本。按《四库采进书目》的记载，编纂《四库》时，先后收到过四部《庄渠先生遗书》进呈本，十六卷本有三部，其中的两部由浙江汪启淑家和山东巡抚进呈，一部由浙江采集而来，十二卷本有一部，是山东巡抚进呈本，正是国图所收藏的四库底本。《总目》和《简目》在提要中说明所采用的是“山东巡抚采进本”，与《四库采进书目》的记载是一致的，也有底本佐证，所以，《总目》和《简目》所说十二卷并非文字之误。至于卷数不同的原因，大概是所依底本不同所致，《四库全书》抄写的底本是十六卷本，而撰写《总目》和《简目》时所依为十二卷本。

三是著录。与十二卷本一样，二十六卷本也流传较少，目前，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台北图书馆”收藏了全本。由于二十六卷本的前十六卷和后十卷文类不同，体例不同，目录和内文也各自成一体，所以，三家机构在著录时便产生了分歧。北京大学作丛书，称《庄渠先生遗书》七种；山西省图书馆入集部，称《庄渠魏先生遗书》十六卷又十卷；“台北图书馆”也入集部，称《庄渠魏先生遗书》十六卷《附录》十卷。受各家著录影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也未将这三部书作同一种书处理，如果不作版本调查，很容易被误导。